

DOI: 10.13288/j.11-2166/r.2015.12.001

学术探讨

现代中医理论发展与创新方式

邢玉瑞*

(陕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陕西省咸阳市世纪大道, 712046)

摘要 在对现代中医理论发展状况全面梳理的基础上, 总结现代中医理论发展与创新方式, 包括科学诠释的解析说明性研究、基于文献梳理的理论建构性研究、通过实践升华的理论创新性研究、提炼科学问题的发现创新性研究四类。提出在总结历代学术思想基础上的教材建设与相关辞书、标准的编著是中医理论体系丰富、规范及框架建构的主体, 面对现代重大疾病的中医诊疗实践是中医理论创新的动力, 凝炼科学问题、结合中医临床、借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实验研究是中医理论加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中医理论研究; 发展方式; 创新模式

近年来, 中医理论的研究逐渐得到中医学界的重视, 一种基本的共识认为, 中医理论发展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当代中医学术发展的瓶颈, 但对如何开展中医理论的研究, 则争鸣不断。为了进一步理清中医理论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有必要对现代以来中医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方式予以系统梳理, 从中或可获得有益的启示。总括现代中医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方式, 可概括为以下 4 个方面。

1 科学诠释——解析说明性研究

任何一种医学的发展都是一定文化的产物, 与特定的思维方式相联系。中医学的产生、发展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 其演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之间具有同步规律^[1]。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发展, 是中医学术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障之一。但自鸦片战争以来, 西方文化凭借着先进的技术与科学, 给中国传统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冲击, 许多民族精英也将中国落后的原因简单归结于传统文化而加以指责, 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式微、断裂。由此对中医学造成两方面的冲击: 一方面中医学的发展失去了固有文化发展的支持, 诚如李致重所指出“当扎在国学之中的研究方法的根系被切断的时候, 中医的科学理论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将随之衰落。而当中医的临床治

疗失去原有的科学与技术体系支撑的时候, 中医便沦落为不见文化思想深根的浮萍草——游离于自身科学与技术体系之外的中医, 所留下的只是原有体系中的经验部分了。然而经验是人类认知过程的初阶段, 它是不能称之为科学的”^[2]。另一方面, 患病人群文化、意识形态观念的更替变化, 在就医选择时对中医和其学术的信任与理解, 决定了中医的社会心理地位与真实发展的规模及其潜能; 同时伴随着西医学的超速发展及占据科学与技术的高台阶, 而中医学发展滞后, 自然导致中医疗法受众对中医学理解的困难以及随之而来的认受性和公信力的降低, 中医学面临着话语权的不断丧失。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中医人历经了百年的探索, 从最早的中西汇通, 到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以及近年提出的中医现代化研究, 都是借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理念、方法、知识来研究中医理论, 试图揭示中医理论的现代科学内涵, 达到现代科学背景的受众对中医学的理解、接受, 当然也是为了借助现代科学及技术以促进中医学的发展。以中医“肾”的研究为例, 沈自尹等从 20 世纪 50 年代始, 历经数十年的研究, 提出中医肾与下丘脑-垂体-靶腺(肾上腺、性腺、甲状腺、胸腺)轴相关的观点^[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基于‘肾藏精’的脏象理论基础研究”, 也是借助现代生物学理论与技术, 试图证明“肾精命火”主要体现为干细胞、微环境和神经-内分泌-免疫(NEI)网络的动态平衡;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2013CB532002)

* 通讯方式: xingyurui@163.com

“肾藏精”主要体现为干细胞及微环境的调和状态;补肾添精法主要通过调控干细胞、微环境和 NEI 网络发挥作用,此理论创新是建立“肾藏精”脏象理论与干细胞和 NEI 网络关系研究的新思路^[203-204]。类似的研究无疑都是对中医学固有理论的一种科学诠释性研究,即借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与知识对中医理论加以解析说明或论证。

此类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中医理论的科学诠释从器官、组织、细胞到分子、基因等,总是尾随其后,似乎难以穷尽;二是借用库恩范式理论的观点,中医学与现代科学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对中医理论的科学诠释性研究的成果,绝大部分既不能纳入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并未为中医基础理论提供新的概念、理论,又无法归入西医学的范畴,也未能在西医学已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假说、新的发现或尚未注意到的新的事实,因此,也受到了一些中医学者的批评^[5]。

2 文献梳理——理论建构性研究

对文献的整理研究,一直是中医学术继承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虽然《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范式,但从形式而言,则不能说《黄帝内经》建构了中医理论框架。历代分类研究《黄帝内经》诸家,可谓从形式建构中医理论框架的最早尝试者,从唐代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分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输穴、营卫气、身度、诊候、证候、设方、九针、补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十九大类,到明代张介宾《类经》分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十二大类,明代李中梓《内经知要》分道生、阴阳、色诊、脉诊、藏象、经络、治则、病能八类,可谓古代中医理论框架建构的概况。

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中教材建设可谓重中之重,而教材建设也是基于文献梳理的理论建构性研究的重要方面。古代中医教育大多以《素问》《神农本草经》《伤寒论》《脉经》《针灸甲乙经》《难经》《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圣惠选方》等经典及名家著作作为教材,还谈不上对中医理论的系统梳理。《医宗金鉴》作为清代皇家主编的专用教材,虽说具有综合性、经典性、先进性、实用性等特点,但从中医药理论建构的角度而言,以上特点恰恰是其不足之处,因为《医宗金鉴》缺乏对《黄帝内经》理论的扼要论述,也缺少本草药性部

分,造成其在基础理论上有所欠缺。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与教育模式的传入,中医教育与教材建设也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基于文献整理研究的教材建设,有力地促进了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的建构。早在 1928 年,由秦伯未、蒋文芳等人提议,在上海召开的我国中医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医学校教材编辑委员会,虽因学术见解不同、意见不统一,最终未能就课程、教材、学制等问题达成共识,但蒋文芳提出的“整理固有医学之精华,列为明显之系统,运用合乎现代的理论,制为完善之学说”,成为其后中医学课程教材建设的指导原则^[6]。解放后中医教材建设的思路,基本没有超越此原则。20 世纪 50、60 年代,北京中医学院编著的《内经讲义》(1955)、杉原德行(白羊译)的《中医学基础简释》(1957)、南京中医学院编著的《中医学概论》(1958)、福建中医学院编著的《中医学基础》(1963)等,开启了运用现代语言文字整理、建构中医理论的步伐,随着统编/规划教材的不断修编,从《内经讲义》的原文选编与现代中医理论建构混合,分化出包含基础理论与中医诊断学的《中医学基础》,再到《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的独立,至今已修编至第 9 版,加之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各地出版的《中医学导论》《中医藏象学说》《中医病因病机学》《中医养生防治学》等基础理论的分化教材,教材建设有力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系统梳理了历代中医理论研究的成果,建构了富有时代特征的中医理论体系框架;二是定义、规范了中医理论的相关概念,并引入了一些新概念;三是丰富、完善了中医理论,补充了思维方法、精气学说、体质学说等内容。此外,基于文献梳理或结合临床研究编著的中医工具书、制定的术语标准等,也是现代中医药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中医大辞典》《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等,都为中医理论的规范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文献梳理的理论建构性研究对中医理论体系的丰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集成有缺漏、归真有变异、纳新有西化等,故还需进一步加强。

3 实践升华——理论创新性研究

临床实践经验是中医理论建构与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医学术发展史上各种流派的形成,均是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中医学在现代社会的

存在、发展,也以临床实践所取得的疗效与经验为根本保障。故邓铁涛指出:中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是继承前人的理论——进行临床实践——总结提高——创立新论。临床实践是传统研究的最重要一环,在继承前人理论的指导下诊察患者、治疗患者,给患者以治疗信息,进而收集接受治疗后反馈的信息,如是循环往复,总结提高上升为理论,以修改、补充前人的论述^[1]。因此,从名老中医诊治现代重大疑难疾病的经验入手,总结创新中医理论,仍然是中医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例如,现代临床常见的脑血管意外、脑动脉硬化症、癫痫、震颤麻痹综合征等多属于中医内风证的范畴,中医称之为中风、眩晕、痫证、颤证等。临床实践证明,这类病症除了具有动摇、眩晕、震颤、抽搐等风气内动的症状外,还常常兼见舌质紫暗或舌下脉络青紫、面色灰暗或青黑、皮肤粗糙、血液黏稠度增高等瘀血症状。何绍奇在《现代中医内科学》^[2]中总结临床实践经验,明确提出“瘀血阻滞,脉道不通,血行不畅,筋脉失濡而手足颤动,屈伸不利,此即瘀血生风”。刘昭纯等^[3]结合临床实践经验,总结出瘀血生风多见于老年患者、多继发于慢性病、多出现神志异常、多与其他内风证并存,进一步完善了瘀血生风的病机理论。再如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日本学者运用黄连解毒汤治疗中风取得良好疗效,继而国内也有大量运用黄连解毒汤加减治疗中风的报道,加之临床大多以清开灵、醒脑静注射液为主运用于中风病急性期的治疗取得显著效果,而清开灵、醒脑静注射液皆可谓集清热解毒药之大成,具有明显的清热泻火解毒之功;其次临床观察发现,中风病急性期的转归与腑气不通有密切的关系,随着大便秘结或不通程度的加重,病程延长、病情加重、疗效降低,而采用通腑化痰、泄热法治疗中风急性期患者,常可取得良好的疗效,有较早地减轻脑水肿。一般认为,通腑化痰、泄热法对中风病急性期的良好疗效,是其发挥了畅利枢机,疏导蕴结之热毒、痰浊的作用,为内生之毒的清除打开了门户之故。这也为中风病毒损脑络病机假说的形成提供了临床经验的支持,在此基础上,现代学者提出了中风病“毒损脑络”的病机假说^[4]。

现代中医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无不与解决现代人类重大疾病及健康问题密切相关,特别是中医诊疗理论的研究,更是着眼于中医治疗的优势病种。中医药类国家级成果奖绝大多数为临床研究成果,即使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也多与临床研究密切联系^[5-10]。其

研究的基本路径为:首先,从名医大量临床病案中提炼科学假说;其次,考镜源流,寻找文献依据;再次,通过临床研究体现创新理论的实践意义;最后,通过实验研究揭示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

当代重大疾病的中医药治疗经验为中医理论的总结提供了经验材料,但目前基于临床实践的中医理论总结创新明显滞后,由于课题研究的分散,结论的离散度很大,如何将其提炼升华为逻辑自治的理论还任重道远。总之,人类防治疾病、促进健康的需要提出种种实用性或技术性的问题,解决已有理论与经验事实的矛盾,寻找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并做出统一的解释,无疑是中医理论发展的永恒动力,也是中医理论研究永远的着眼点。

4 科学问题——发现创新性研究

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问题是科学发展的真正灵魂,贯穿于科学研究的始终。科学研究不但开始于问题,而且正是问题在推动研究,指导研究。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它所研究问题发展的历史,是问题不断展开和深入的历史,正如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说“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11]。

中医学历经千百年的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以及与中国古代哲学融合所形成的中医理论中,蕴含着许多科学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如中医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整体思维指导下所形成的形与神辩证统一的思想,为研究人体生命活动与心理活动的关系提供了思路,围绕这一命题,现代学者在系统梳理古代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自然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建构了中医心理学、中医情志学等理论体系。再如人类生活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环境之中,相对而言,现代医学的发展主要着眼于空间维度,相关的研究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对于时间与生命的关系研究较为薄弱;而传统中医学更重视时间维度,对时间与生命活动以及疾病的防治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时脏相关的命题^[12]。时脏相关命题具有丰富的科学价值,但并未引起中医学界的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大多只局限于古代文献的梳理和临床验案的报道,已有的实验研究也仅仅是力图证明有关经典理论的正确性,缺乏创新性的研究。现代应当在临床流行病学调研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总结和归纳中医有关人体生理、病理节律模式,探索时间节律的调控机制,建构新的时

脏相关理论,进而指导中医临床诊断与治疗,并开发针对时间相关性疾病的治疗方法与技术。从小的方面来说,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有故无殒,亦无殒”的观点,认为药物的效用、毒性反应与患者机体的状态相关,提示在完全符合辨证治疗的理想状况下,在一定的范围内,药物的耐受性及毒性反应是随着机体疾病状态的不同而变化的,由此开启了中药毒性评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3]。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对此也可借用林德宏评价东方自然观对现代科学的价值时所说进行总结,即“古老的东方自然观不能代替现代的科学,它的功能是为科学研究提供一种理论思想、思维的方法,提供某种思路 and 角度”^[4]。中医学经验与理论中所蕴含的科学问题,则为现代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极佳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综上所述,现代中医理论发展与创新方式可概括为科学诠释的解析说明性研究、基于文献梳理的理论建构性研究、通过实践升华的理论创新性研究、提炼科学问题的发现创新性研究四个方面。其中在总结历代学术思想基础上的教材建设与相关辞书、标准的编著,可以说是中医理论体系丰富、规范及框架建构的主体;面对现代重大疾病的中医诊疗实践,是中医理论创新的动力;凝炼科学问题,结合中医临床,借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实验研究,是中医理论加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以上仅是对现代中医理论发展与创新方式的分析归纳,至于中医基础理论发展滞后的问题、原因等深层次的研究,还有待以后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李如辉. 论中医文化学研究 [J].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

2002, 26(2): 4-7.

[2] 李致重. 从国学看中医 [J]. 中医药通报, 2006, 5(1): 1-4.

[3] 沈自尹. 再从证的研究探讨中、西医的互补性 [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9, 19(3): 180-182.

[4] 李振吉, 于文明, 张先恩, 等. 973 计划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实施概要(2005-2009)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1.

[5] 李致重. 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 [J]. 科技导报, 2001(8): 24-27.

[6] 周鸿艳, 李志平, 李和伟. 近代中医教育的反废止努力: 以课程教材建设为例 [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10, 27(4): 131-132.

[7] 邓铁涛. 邓铁涛文集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 337.

[8] 何绍奇. 现代中医内科学 [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1: 455.

[9] 刘昭纯, 马月香, 刘红杰, 等. “瘀血生风”假说的形成及其意义 [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5, 11(2): 88-91, 95.

[10] 李澎涛, 王永炎, 黄后福. “毒损脑络”病机假说的形成及其理论与实践意义 [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1, 24(1): 1-6.

[11] 卡尔·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 [M]. 傅季重, 纪树立, 周昌忠,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318.

[12] 王彤, 郭霞珍, 王隽. 中医脏理论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 [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9, 16(6): 22-24.

[13] 李会芳, 邢小燕, 金城, 等. 浅论“有故无殒, 亦无殒”的内涵及其在中药安全性评价中的意义 [J]. 中医杂志, 2008, 49(3): 281-282.

[14] 林德宏. 东方的智慧 [M].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605.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Methods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XING Yurui

(Basic Medical Department of Shaanxi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Shaanxi Province, 712046)

ABSTRACT Based on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the status of modern Chinese medical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methods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are summarized in this article. There are four categories of researches,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udies for scientific explanati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ve studies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oretical innovative researches upon practical sublimation, and discovery innovative researches through refining scientific questions.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compiling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relevant dictionaries and standard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academic thoughts during all previous dynasties could be the subject of Chinese theoretical systemic enrichment, standardization and frame construction. Facing modern critical diseases, Chinese med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actice could be the power for Chinese medical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arrying out experimental researches by refining scientific questions, combining Chinese medical practice and depending on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ld be the inevitable course for Chinese theoretical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ese medical theory research; development method; innovative model

(收稿日期: 2014-10-15; 修回日期: 2014-12-10)

编辑: 崔京艳